

行动研究 与 社会工作

Action Research and Social Work

主 编 杨 静 夏林清

副主编 张育华 朱莹琪 张 杨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行动研究与 社会工作

Action Research and Social Work

主 编 杨 静 夏林清

副主编 张育华 朱莹琪 张 杨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行动研究与社会工作/杨静,夏林清主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2
ISBN 978-7-5097-5514-3

I. ①行… II. ①杨… ②夏… III. ①社会工作—研究 IV. ①C9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11255 号



行动研究与社会工作

主 编 / 杨 静 夏林清
副 主 编 / 张育华 朱莹琪 张 杨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社会政法分社 (010) 59367156
电子邮箱 / shekebu@ssap.cn
项目统筹 / 童根兴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责任编辑 / 谢蕊芬
责任校对 / 赵贝培
责任印制 / 岳 阳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版 次 /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5514-3
定 价 / 99.00 元

印 张 / 30
字 数 / 515 千字

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序一

张李奎

中华女子学院院长 教授

《社会工作与行动研究》一书是由中华女子学院性别与社会发展学院和社会工作行动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2012年海峡两岸暨香港社会工作行动研究研讨会”的成果汇编而成。近些年来，由于行动研究有强烈的实践性取向以及从实践中发现课题（问题的现实性），在实践过程中研究问题（研究者的立场、研究人员和被研究人员的关系、知识本土化），研究成果能转化为具体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寻找改变的可能性和促进改变）等特点，它不仅作为一种研究工具和方法，更重要的是从认识论层面上，作为一种全新的研究理念被研究人员和实践工作者接受。也正是鉴于行动研究的这些特点，作为自助、助人的社会工作，如何在推动专业社会工作发展的过程中，立足于本土，尊重根植于本土历史脉络中的经验，如何细致、人性化地对待参与行动过程中的所有人，如何将理论扎根于社会，投身于社会实践，将生产本土社会工作的理想化为现实，正是我们这次研讨会和论文集出版的初衷。

该书收集了来自海峡两岸的高校教师、研究人员、基层社区工作者等人多年的研究成果和体会，既梳理了行动研究的发展背景，又从不同角度介绍了他们对行动研究的理解。值得一提和提请各位读者关注的是该书每位作者都涉及了具体的案例，与一般的案例分析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自己也是这个案例的一部分，在他们的剖析、审视、检讨、反思和学习的过程中，我们不仅分享了他们的经验，更体会到了行动研究的力量。该书的出版只是一个起点，期待越来越多的成果和经验面世。

2013年8月

序二

对撞满怀

——历史节点中的社会差异构形

夏林清

台湾辅仁大学心理系 教授
台湾行动研究学会创会理事长

这本书不只是一般的研讨会文集，它是大陆和台湾一小群实务工作者由相识相知到相惜的一个副产品。我们彼此之间所遭逢的碰撞，犹如行进中的两人，在一街角转拐处相撞了个满怀。这一撞，眼冒金星！双方身心所系的历史脉络与实践行动所彰显的社会差异，要求我们得明白表达自己，同时要长见识地去认识对方。

当实践工作者能够清晰勾勒特定社会现场里人们的困难境遇时，他在引领读者进入了解他人的过程中，同步认识到了实践工作遇到与难以突破的课题；又或是当他深刻体认着实践工作的不容易处，从而铺陈出自身内心矛盾与外在践行之间相牵连的关键点时，他激发了读者碰触与反观自己的情感与意欲；这时，作者与读者之间就有机会建构一种关系的空间。正是这样的空间涵容着人们具体社会存在的各样差异，也使得平日易被遮蔽掩埋的历史脉络露出五彩颜色的一些些线头。我们想追索与发展的行动研究的知识与方法，就是要能支持实践者开路寻伴，支撑实践行动相续相生！

走在推动社会改变取径行动研究方法的路上，我是如何被撞得直冒金星的呢？台湾的大学社工教师绝不会遭受到 C 校土石流般的行政权力的侵袭（吕新萍文），亲历切肤之痛而体认了“行动起来并改变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的社工教师，所萌发的自主力量应该会是深沉的气。激进社工在台湾，早于 1980 年代就被提倡，工业社会工作也在台湾 20 世纪 70 到 80 年代间被应用过，然无甚痕迹留下。当前的大陆，建筑工人正在承受着的劳动压迫，直逼人心地要求社会工作不可以回避抗争，反而应该“把非正式的、乃至创

伤性的社会抗争转变为正式的、积极的、建设性的社会抗争”（郭伟和文）；李大君于文章中更明指“社工实践施暴者”的不义。若前面这三位揭示了大陆现阶段社会工作专业在学院中的处境，指出了专业被工具化使用时所发生的丧志与失能的危险，那么，“野生”的李俊所叙说的故事的主人公就不会只有他一人，而会有许多如他一般的“自然中的野生种子”（李俊文）；年长若干的吉家钦已然是荆棘丛中锻炼出来的一名非学院派的好社工。当我们自觉地视实践行动为在社会现实中探究改变之道时，社会工作这一个方兴未艾的专业才有机会在中国走出自己的路。那么，这一次，台湾行动研究学会与大陆社会工作实践社群的交流发生在怎样的一个历史节点呢？

当我们猛然在转角与人狠狠撞上的那个片刻，眼冒金星地盯住对方一会儿，凝神站稳始知身在何处，再定睛看清欲往何处，我之于杨静就是这样一个作用物吧！“我站在了一个历史的交叉口”（杨静文），这不只是自觉而已，它是认受了若要将大陆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作为自己一生的志业，那就不可不识地脉水文，不能不心眼合一、手脚到位地努力劳动着，而且还要接续起青年人与高小贤老师、梁军老师这两代人在大陆社会内部的历史经验差异的距离；继往开来并非易事，它需要我们创造逆势操作的社会条件。在行动探究的实践过程中，为自己和他人创造改变得以发生的条件是正确认识行动研究方法的一个角度。

我，出生、成长于台湾，年轻时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梦想热情诱发我在心理系中做着激进社工的活（当然，心理学中亦有相应的激进或批判的路径），这几年真是在对撞的金星里，逐渐发现大陆与台湾的行动者的行动样式和身心形构的差异是多么饶富趣味，更幸运的是我们所共享的思索社会解放的认真态度，督促我们要辨析地汲取人文社会科学里尊重人与发展群己关系的法门。“社会改变取径的行动研究”是在这样的追寻过程中被我们持续研发着。

这本文集所呈现的便是，一群着实在事情的行动者，探究社会现况如何可能发生变化的实践智能。

2012年8月于台湾

序三

行动研究：社会工作的新视域

王思斌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会长

对行动研究，我了解不多，更没做过。我看过夏林清老师翻译的行动研究的书，以及大约 15 年前翻译的一篇文章。行动研究对社会工作来说是一个新视域，怎样使用它，在大陆讨论得不是很充分，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下面我就将自己的理解和疑问说给大家，希望我的发言不是搅局，我是抱着求教的态度和提问的角度来发言的，希望大家批评。

一 行动研究的谱系与面向

行动研究的基础是行动。行动的概念应该说来自社会学，韦伯的社会行动理论和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理论都是有名的。舒茨说行动是可以理解的，有人说是不可以理解的，都涉及人在行动中的地位及其所思所想的问题。行动是宽泛的社会现象，它包含了人的意义在里面，将人的意义投入里面互相观看、互相理解和采取行动，这就是当时的一个社会行动。社会工作是社会行动，是社会工作者和服务对象（或者伙伴、受助者）一起投入意义理解的过程。行动本身是一个具有关系性的东西，这个说法强调了关系性。行动本身有关系性和能动性的含义。社会学强调理论，并到此为止，它不会进一步去实践。社会工作把行动概念引进来，为的是实践。

社会行动十分复杂，社会工作行动有何特殊性，与其他的行动有何不同？我们希望能说清楚。如何讨论社会工作行动或者社会工作行动中的行动？这里涉及行动的多样性问题。社会工作的行动有可能是内省的，有可能是认识的，我们也可能把行动研究看成是反思性的，它对现存的制度予以质疑或者推动其改变。我看过一些学者的行动研究的文章，发现大家对行动

研究的理解是比较泛的，好像所有有关行动的研究都是行动研究。有人说自己是批判的，有人说自己不是批判的，就是行动的。行动有很多种，一般的社会工作是一种行动，有复杂的内心思绪和想法的是一种行动，有很深历史背景的也是一种行动。一些学者在文化脉络中开展社会工作，将今天的行动与文化 and 历史对话，相勾连，这是跨时空的行动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认识行动就十分复杂。行动研究的目的也具有多样性，对行动的认识途径也是多样性的。有人站在被研究的行动“之外”看行动，有人将自己也放在里面进行研究。这也使得行动研究具有多样性。

我写过一篇文章，提出一个概念叫共事系统，即人们之间的共事是一个时间和空间都联系在一起的行动，是一个更深刻的行动。人们的行动都是和别人相关的，甚至是与历史相关、与未来相关的行动。在这个意义上，做行动研究的时候就和历史和别人在一起。我和谁在什么样的相互关系下在一起，这是复杂的。对行动可以做很多不同的理解，这是行动研究的认识论问题。不同的认识论提出了行动研究的不同认识角度。当我们做行动研究的时候，你看到什么行动，你怎么对待这个行动，这是我们希望说清楚的事情。如教师节老师收到学生送来的鲜花，对此行动有不同的理解。对行动的不同理解是与理解者与行动的关系及其知识、视野有关的。

行动研究要说明是谁的行动，谁在研究？对社会工作来说，有一个无知、无视、悬置的区别。有时候我们不知道那个东西应该算不算作我们行动系统中的东西，这是无知。有时候是无视，他觉得不需要涉及或者不需要看那个东西，熟视无睹，漠视。悬置就是把某个事暂时放在那里不管，暂时不作为我们理解的对象。这些决定了我们理解的行动是什么。

另外一个就是行动是外显的还是内在的，是部分的还是整体的。运用胡塞尔的说法，这与外部给了我们什么东西有关，他用了一个概念叫“被给予性”，就是外界给你什么东西了。如夏老师讲课，引起普遍的称赞，这就是某种被给予性，这给了我们认识的新事实。

还有，行动是即时的还是序时的？如农民工子女上不了学，我们就大声呼吁甚至采取行动，这个行动完了吗？还有没有后续呢？我们研究的行动是片段的，还是长时间的，甚至是过程呢？对此仁者见仁，智者见者。有人认为行动是一个谱系，包括了历史、现在和未来，它包括了我们自己 and 与我们相关的人。

我自己没有做过行动研究，我希望行动研究有一套说法，也必须有一套说法。肖恩的著作很好，但读完后还不十分过瘾，即从中理不出一、二、

三来，可能是我悟性、修行未到。从科学面向来说，行动研究也要讨论相关性问题，当然不是决定论。行动研究不是决定论，是理解和体悟的东西，当然还有一个谁影响谁的问题。理解主义讨论意义，社会工作讨论的案例和特殊现象怎么去理解，怎么去讨论这个特殊现象？我认为，我们必须用一个“一般的”视角（或基本的共识）去理解特殊现象，否则无法理解认识他人的理解。行动研究既需要意会也要能言传。要言传，就要清楚地说出几条规则。如何把行动研究做成一个和别人能交流的东西，也让别人能够理解，可能有利于行动研究的发展。

行动研究追求改变。法国社会学家图雷纳说社会学应该是干预的，图雷纳的干预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的行动有何不同，干预和反思如何去处理？社会工作的行动研究是一个综合探索，我们不能切断社会工作的系列行动，如果我们往前后左右看，一系列的行动都进入了我们的视野，而究竟采取什么行动，要看情境，在不同的情境下会有不同的行动。在某一项干预服务中，初期、中期、后期的行动是不同的，因为各个时段的问题不一样，背景因素不一样，目的也不一样。我们常说“推（推广）”。推就是一种行动和行动方向，我们如何理解“推”这个行动，我们和谁在一起“推”，这很复杂。不同的社会工作实践有不同的行动研究，一般救助的、解放的取向有不同的行动研究。

二 行动研究的新视角和课题

社会工作教育和实践者常说“在一起”。“在一起”和我们说的行动研究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在一起”就是一路走来，是不是就是一路行动，一路行动是否就达到了我们所要达到的目的？还是开始没有一个行动目的，就是走着看？作为社会工作研究对象把谁的行动看成行动，社会工作人员的行动是如何进入行动的？反思者在什么角度反思？是在共同的活动中反思吗？如果是后一个，就有复杂性，因为行动具有结构性和开放性。在做行动研究时把哪些“其他”因素放进来，哪些因素不放进来，也应该是有说道的。当和同行交流的时候，需要把关键的行动要素拎出来，才能去交流，才能达成共识。行动研究的边界在哪里，需要讨论。

改变性的行动研究，研究者在改变谁？那些干预者认为“合理的”改变是服务对象需要的吗？这需要研究。行动是为了改变。在行动过程中，双方是主体性的相互认识和理解，但如果社会工作者用我们自己的想法去

改变对方，是否所有的“改变”都合理？这也需要研究。对改变行动的选择也是如此——选择什么行动，为什么选择这个而非那个，其逻辑何在？行动研究开始有无清楚的目的？契约性的目的是行动研究过程中出现的，还是开始于共识的？还是事先设定的？目标和行动过程的复杂性如何处理？行动的复杂性和难以量度性如何解决？

做行动研究我们要走向哪里？我们有目的地吗？杨静做了多年农村社会工作，很辛苦也很有成就。现在农民上楼了，行动研究还跟着。我开玩笑式地问：这项行动研究还要跟多久，有完吗？我说你加入村籍算了。现在很多研究是项目制，项目制有时间要求，较短的项目可不可以开展行动研究？是用行动研究的方法开展服务项目，想通过行动研究来处理某个问题，还是对整个过程做行动研究？什么是一个行动研究的结束？项目时间到了要结束，但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甚至发现了新问题，后面的行动（研究）怎么办？这是很复杂的问题。在实务领域好像行动没有止境，那就产生一个问题：行动的边界在哪里？

还有行动后果的理性考虑问题。我们不讨论理性主义的问题，但不等于我们不讨论理性。行动研究也是一种理性的活动，我们如何看行动内在和外在结构对行动的挑战，介入时我们能触动外在和内在结构吗？服务对象有多少承载力来承受我们的“行动”？如果我们完全不了解，就可能是个问题。

三 社会工作行动研究的限制与可能的突破

社会工作行动研究有一些限制。限制是对于作为研究者的行动者或作为行动者的研究者而言的。第一是专业关系的考虑。社会工作强调与服务对象的联系和认同，强调“一路走来”“共同理解”，行动研究更强调“打成一片”，但是这里也有一个社会工作的专业关系问题。社会工作者不是服务对象，行动研究通过共同行动达成共识实现改变，这对专业关系存在着某种挑战。第二是知识的限制。行动研究需要的知识很多，似乎人们都可以参与到这种研究中来。实际上，行动研究需要很多知识，研究者要有理论知识、实践知识和人生经验。知识不足、实践经验不足常常成为成功进行行动研究的限制。第三是能力限制。社会工作是复合的行动，是整体的东西，需要研究者具有很多能力，需要有很强的判断能力、预测能力、协调能力、改变力和品格意识，如果没有改变的韧性和品格，没有与服务对

象协同共事的能力，复杂的行动和行动研究就难以成功。

社会工作的行动研究可能给社会工作带来新的突破：社会工作是一种道德实践，是一个改变的实践，社会工作的行动研究是知行合一的，它会形成对社会工作行动的整体性认识。如何做整体的反思和从整体的角度寻求改变，这与以往的研究有不同之处，这将会给我们带来新的思索，社会工作行动研究的成功实践也会给社会工作带来新的经验。

行动研究在大陆社会工作领域刚刚开始。杨静要把那次关于行动研究的成功讨论面世，让更多人了解，以推动行动研究的发展，并命我写序。推辞不过，就把那次会议开幕式上的几句话稍作整理。上面的话是一个行动研究的外行站在外面对行动研究的评论，可能有些说法并不合适，更不符合行动研究的原则。希望大家指正。

2013 年 8 月

序四

杨 静

中华女子学院性别与发展学院副教授
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行动研究中心主任

很多学科都在研究和推动改变，社会工作是其中一种寻求改变的路径，社会工作者终其一生的志业即在探讨个人、群体与体制的变革之道。然而，在形形色色的改变工作中，如何清晰辨识以及反身回观改变的路径、手段、效果和方向，以及谁在做什么让谁改变，甚至如何反思改变本身，这些都是从事改变工作的人不断要寻找的答案。否则改变本身也会变成形形色色利益和权力的借口，也会是导致更加不公平的借口。

行动探究作为一种方法论，其发展呈现一个连续的光谱，从深受实证主义影响的行动研究发展到批判理论、建构主义以及女权主义影响下的行动研究。

深受实证主义研究传统的影响，一提到“研究”二字，人们就会认为这是大学教授或者学者专家们的工作，研究的目的在于建立普遍的原理原则以便进一步类化理论知识，从而指导实践者的实践活动。而“行动”则是实务工作者的职责，将研究者所研究出来的理论进行实践，研究活动并不明确指向为了改变。行动研究则是针对上述的对立和两分而产生的，它强调生产知识的目的是促进社会改变，透过将“行动”与“研究”结合为一，企图缩短理论与实务的差距，产生基于实践和应用于实践的知识。杜威（Dewey, 1859—1952）和勒温（Lewin, 1890—1947）是学术界公认的行动研究思想的先驱。杜威所提倡的教育应该与实践结合，并亲自参与到教育改革的实践中去的风范，奠定了行动研究的基本思想。而首位提出“行动研究”一词和完整框架及方法的是勒温，他提出“了解世界的一个最好方法，就是尝试改变它”，也道出了行动研究的核心思想。该思想辩证地指认了了解与改变之间的关系，即只有去行动，投入改变的过程才能做到真正的了解，从而道出了行动研究的精髓。也就是说，只站在外围研究别

人的行动，不可能深刻地认识其中行动者的行动（行动科学）。在这里不仅要勒温和杜威两位学者说了什么，他们身体力行自己创造的理论，投身于社会改革的志业中，是真正的行动研究者，他们的学说有强大的生命力不仅在于理论本身的冲击力，更是因为他们身体力行验证了自己的理论。

行动研究产生之后，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沉寂，到20世纪70年代，受到当时国际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以及当时社会学批判理论等的影响，在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地区花枝并茂。在英国，主要以课程改革为主，发展出教师即研究者的行动研究理念，这派对后来教育领域的行动研究影响很大。在美国，则以实务工作者为背景，发展出实务反省的行动研究思维方法；这派对实务工作者，包括社会工作者的影响比较大。在澳大利亚，受哈贝马斯批判理论的影响，发展出批判的、解放的行动研究。这三种行动研究在后人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台湾辅仁大学的夏林清20世纪80年代师承美国 Donald Schön 学习实务反省的行动研究（译有《反映的实践者——专业工作者如何在行动中思考》），并结合了 Chris Argyris 的《行动科学》（*Action Science*）^①，同时呼应批判理论学派哈贝马斯（J. Habermas）的理脉即批判解放的行动研究，更加彰显批判解放的实践取向认识论的学问，在台湾近30年投身于社会实践，在实践中丰富、发展了行动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并使之更有力量、更具人性化（对此我后面再详细论述）。这种行动研究主要是在一个特定的社会过程中，面对特定社会群体及其所生活着的问题处境，力图探究社会变革（个人、集体及制度）路径，发挥行动者辨识现象场域复杂性与行动抉择有效性（有效指的是对互为主体/主体间协作关系的发展）的作用（王芳萍，行动研究讲座），因此也被他们自己命名为“社会改变取向的行动研究”，从而将行动研究远远带出了学术方法论层面的讨论，深刻揭示了行动研究的实质，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行动研究。

有学者对此进行了归类，台湾学者陈惠邦在1998年出版的《教育行动研究》中，介绍了国外学者 Grundy（1982，1987）对教育行动研究的相关论述：受哈贝马斯对人类知识的不同类型与旨趣做了区分的影响，Grundy把行动研究区分为三种相对应的模式：行动研究的技术模式（technical model of action research）、行动研究的实践模式（practical model of action research）、行动研究的解放模式（emancipation model of action research）。也有学者将行动研究分为科学技术形式的行动研究、实务道德形式（实务取向）

① Donald Schön 和 Chris Argyris 两个人则是转承勒温（K. Lewin）和杜威（J. Dewey）。

的行动研究和批判解放的行动研究^①。

行动研究受不同理论和研究方法论的影响，理解不同、使用者的使用目的不同，就出现了不同的行动研究实践路径。这从行动研究的定义中能窥见一斑。最初勒温将结合了实践者智慧和能力的研究称为行动研究。英国学者艾略特（Elliot，1991）进一步定义为“行动研究是对社会情景的研究，是以改善社会情景中行动质量的角度来进行研究的一种研究取向”。这些概念仍然指出行动研究的主体是研究者，其目的仍旧是研究。在《国际教育百科全书》中，“行动研究”被定义为：“由社会情境的参与者为了提高对所从事的社会或教育实践的理性的认识，为加深对时间活动及其依赖的背景的理解所进行的反思研究。”在这个概念中，参与社会情景的所有人即研究者、实践者都是研究者。但上述的概念只是明确提出对参与的社会情景进行研究，却没有提出研究者对自己的行动进行研究和反思。

从行动研究定义及其类型的不断发展来看，起初的行动研究仅仅是在弥补之前实证主义研究将理论与实践分开的不足，鼓励研究者将研究与行动结合，是研究者所从事的行动研究，而随着社会学理论的发展，研究范式的不断变化，行动研究作为一种方法论也不断丰富其内涵，出现了实践取向、批判解放取向等的行动研究。夏林清在台湾的实践，更加将实践取向、批判解放取向和女权主义的理论结合，丰富和发展了行动研究在华人社会的应用与实践。

有学者的研究指出，大陆引入行动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首先在教育领域中使用，该学者在google中搜索“行动研究”这一词条，并把搜索结果限定为“至少显示摘要”，搜到约22万条有关行动研究的结果。当他将搜索结果限定为“始于2010”和“至少显示摘要”时，显示结果为14600条（穆树航等^②，2011）。他发现主要是教育研究者、管理者作为研究主体所进行的教学与教育改革的研究，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研究，尤其是在很多国家基金、课题基金、国外基金的推动下进行的教育行动研究。如被评价为社科研究解决社会重大问题的成功范例的“中国西部女童教育行动研究”，是国家“八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西部女童职业教育行动研究”，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并由政府的教育部门联合学校教师共同组成项目小组，力图通过系列的子项目和活动，提升广西女童的职

① 在后面的文章中，我会详细论述这几种的异同。

② 穆树航、昌艳飞：《行动研究在我国“上热下冷”的冷思考——兼作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反思》，《基础教育研究》2011年第21期。

业教育水平,进而改善女童的生活现状的研究。整体来说,一线教师自主对自己的教学开展行动研究的比较少。近年来北师大教育系和台湾夏林清老师的团队合作致力于推动基层教师的行动研究,已经有一批成果出来^①。

仅次于教育领域的行动研究的是20世纪90年代,在国际基金会的推动下,中国大陆在发展领域引入参与式发展理论,在农村和民间等大规模地推动参与式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参与式的行动研究也因此被使用,作为对参与式项目的研究的重要方法。有代表性的研究是《打工者——参与式行动研究》,该书的作者认为此研究使用了参与式行动研究的方法^②。作者在书中强调行动研究必须是研究主体参与到研究客体的行动中,与研究客体共同行动,同时进行研究,即行动与研究融为一体。作者认为最地道的行动研究是研究客体同时是研究主体的研究,即行动者自己研究自己,目的是直接指导自己的行动。我想,这是他们的理想,在著书时其实一位研究者身居国外,是通过和国内的研究者共同书写、发邮件以及短时间的田野来完成的,另一位国内的学者则在研究的基础上创立了一个打工机构,可谓真的参与。但是其研究客体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则需要再讨论。但无论怎样,在这本参与式行动研究的书中,仍然将研究者分为研究主体和客体。

在社会科学中所进行的行动研究,主要以学者作为研究的主体,他们就某个社会实践进行的研究,其中有一种是基于参与或者主持一些实践项目所进行的研究;一种是研究别人的行动,多数关注行动本身,仍旧为了研究的目的,有一些研究可能是为了改进行动,但并没有在研究报告中说明如何改进了行动^③;第三类研究是一些实践者对自己的实践所开展的行动研究,目的是改进行动,尤其随着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和实务的发展,这类研究逐渐多了起来,本书所编辑的大陆的一些案例就是这方面的尝试。

在大陆使用行动研究进行研究的文章中,对行动研究的理解主要呈现三种特征。

第一,一些研究是国家、省市课题或者一些基金资助的课题,由学者或者官员主导,问题导向,研究对象被拉入项目中,在项目执行过程中被影响和改变。

第二,国际基金会推动的发展项目,将一个项目过程作为行动研究的

① 详见《海峡两岸行动研究研讨会论文集(2009年)》,对此我没有做细致的资料研究,因为本文的重点不在研究教育中的行动研究,仅仅说明行动研究在教育中的状况。

② 参与式研究的报告很多,不限于此。

③ 由于时间和所收集资料的限制,在知网上没有找到社会学研究中的行动研究文章。

过程，项目推动改变，项目结束，对后续的工作没有持久的跟进和推动，很多情况是项目结束改变工作也就结束（甚至退回原地的情况也很常见）。

该类项目多由学者主导，采用参与式行动研究的方法，和当地的相关方结成项目合作伙伴，但实际上，被研究者参与的程度等因为研究报告无法呈现，很难去考证。很多学者对参与式有很多的反省^①。

第三，基于主流对学术报告规范化的要求，大陆的行动研究报告基本上都是比较能被主流认可的学术研究报告。

鉴于大陆的社会工作教育和实务界刚开始尝试用行动研究，且认识粗浅，正如本书序中北京大学的王思斌老师所说，行动研究是一个社会工作的新视域，将对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等发挥一定的作用，因此，我们召开2012年海峡两岸暨香港社会工作行动研究研讨会以及出版此书的目的，就在于介绍台湾和香港同行已经在使用行动研究进行社会实践和改变的经验，以期对大陆正在飞速发展的社会工作教育和实践起到经验对照参看的作用。

本书所收集的行动研究报告，都由来自台湾、香港和大陆等三地的学者和一线实务工作者基于自己的实践经验和研究撰写而成，呈现了对行动研究的不同理解，其书写风格的不同也反映了大家对行动研究的不同理解。但本书所编辑的案例，近一半来自台湾夏林清为代表的一批人所推动的行动研究实践报告，反映了该派行动研究的一些特点。

如果读者想了解夏林清老师所发展的“社会改变取向的行动研究”的实践理脉和方法，以及这支行动研究路径究竟在表达什么，与社会工作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夏林清、成虹飞、廉兮以及王芳萍、杨静老师等的一组文章基本上从方法论、具体方法以及作用等方面进行了清晰的说明。台湾辅仁大学心理系教授，台湾行动研究的创会理事长夏林清教授在文章中清晰指出，行动研究是“行动者的社会探究之道”，“古今中外，每个人都是行动者”，“一位没上过一天学的大爷大娘，可能在他的生活世界中，以他的智慧探寻着如何自利利人且抵制着不正义；……不论学资历，他们都是行动者，他们的言行与行事路径均蕴含着知识”，将行动研究从学者的专利还原到普通的人身上，是对只有学者拥有知识的传统知识观发出了挑战。台湾新竹教育大学教育与学习科技学系副教授成虹飞老师则进一步对传统

^① 郭占锋：《走出参与式发展的“表象”——发展人类学视角下的国际发展项目》，《开放时代》2010年第1期。

的知识概念进行了挑战，他在文章中写道：“这种知识不是抽象的、去脉络的（de-contextualized）、冰冷的、理性抽离的知识，而是一种整体的、动人的、有温度的社会性知识，不但能让自己更明白里里外外发生了怎么回事，更能从中发现自己行动的意义，连结社群的支持，挣脱无力与绝望，滋长内在的力量，不断自我转化，坚持不懈地行动下去。”台湾东华大学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廉兮老师则对夏林清老师所发展并称之为“社会改变取向的行动研究”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中华女子学院的杨静老师的文章则谈了她自己在大陆地景中从师夏林清学习行动研究的一些体悟和思考。

本书收录了三篇来自大陆资深妇女 NGO 领导人的行动研究报告，她们分别是河南社区教育中心的梁军老师，陕西妇女婚姻家庭研究会的高小贤老师以及中央党校妇女研究中心的李慧英老师，她们用自己对于行动研究的理解梳理和总结了其多年扎根于本土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思考。

本书部分文章是来自两岸三地的社会工作教育者和具有社会工作专业背景的实践者的一些行动研究报告。如台湾政治大学社会工作研究所的王增勇老师的文章对台湾的社会工作执业资格认定考试制度进行了深刻分析和批判，他认为这种考试制度更加将原本就存在的社工实务与学术的疏离与断裂的矛盾，透过官方考试，浮上台面……社工知识与诠释权向学术界倾斜，间接地否定了社工员作为专业实践的主体性。实务默会知识的价值被抹杀，知识的吸收也不再是为了自己反身性的提升，或是服务案主能力的加强，而是为了累积证照所带来的经济资本与社工师这个新兴文化符号所代表的社会资本。一个不再从自身经验出发求知而以外来知识体系为答案的专业，“集体弱智”或许是社工师考试所带来专业知识异化的最佳写照。其对台湾社会工作证照制度的批判对大陆正在兴起和发展的证照制度又何尝不是一种参考和借鉴。台湾东吴大学社工系助理教授李忆微老师的文章，以其参与创办的一个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为例，探索了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在其发展过程中的管理以及内部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和非专业力量之间的张力等，对目前大陆正在雨后春笋般发展的专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面对的内外张力以及正在兴起的专业服务力量和非社会工作专业力量之间的不同有非常大的参照价值。台湾辅仁大学心理系兼任讲师王醒之老师的文章，指出了在社区工作中多重社会变革的重要，即除了重新面对受压迫者的结构性位置外，也反身性地解构了主流助人关系以慈善为基础的建构，批判地审视了“助人者”“受助者”的辞源，尝试发展一种“互助关系”的专